

《靖江宝卷·草卷选本》序

车锡伦

在中国说唱艺术史上,宝卷是一种特殊的民间说唱艺术品种,演唱宝卷称作“宣卷”,或作“念卷”、“讲经”。宝卷渊源于佛教的俗讲,产生于宋元时期,在民间佛教信徒礼佛了愿、追亡荐祖的信仰活动中演唱。明代正德以后,各种新兴民间教派均以宝卷的形式编写布道书,宣卷又成为这些民间教派信徒的宗教活动。清代初年,宣卷发展为广大民众参与的民间信仰、教化、娱乐活动,在南北各地流传。在北方,流行于河北、山东、山西,西至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称作“念卷”;在南方,主要流行于江浙吴方言区,称“宣卷”或“讲经”。从现存的宝卷文本看,前期的宗教(佛教和民间教派)宝卷,主要是宣传教理,绝大部分不是文学作品;清初以来的民间宝卷,则主要是演唱文学故事。但是,不论是前期宗教宝卷或后期的民间宝卷,它们都是在宗教或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进行宝卷的专题研究,系统整理宝卷文献,并沿着清及近代民间宣卷和宝卷发展的轨迹,在南北各地做田野调查。结果发现,尽管有些图书馆入藏有不少清代前期北方民间念卷的宝卷手抄本,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区,民间却已不见念卷的踪迹,只在甘肃河西走廊的偏远农村中,尚残存有念卷活动;晚清到民国年间,宣卷在江浙吴方言区曾极盛一时,如今只有苏南农村个别地区偶有宣卷班社的活动,但在苏北的靖江农村中,宣卷却以“做会讲经”的形式,别具特色、生气勃勃地存活着。1988年我发表了调查报告《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此后十余年间,一直做跟踪调查,陆续发表了靖江做会讲经中“醮殿”和“破血湖”两个仪式的专题报告。在调查靖江做会讲经的过程中,我得到了靖江(县)市有关部门和许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也同一些讲经艺人结成了朋友。因此,当靖江市文化局的同志们将他们记录整理准备结集出版的靖江宝卷请我做序时,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结合我多年的调查研究,对靖江的做会讲经活动和靖江宝卷做简要的介绍,同时对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开发做会讲经问题提出个人的建议。

一、靖江“做会讲经”是信仰、教化、娱乐相结合的民俗文化活动

从中国宝卷的发展过程看,民间的宣卷与前期的宗教宣卷不同,它们是一种民众广泛参与的信仰、教化和娱乐活动,这些特征在靖江做会讲经中尤其明显:它是以教化为“核心”、以信仰为“本”、以娱乐为“用”的民俗文化活动。靖江做会讲经的教化功能,除了传授各种民间知识外,主要是道德的教化。按照讲经艺人和当地民众的说法,就是“劝善”。讲经艺人在说唱“圣卷”(神佛故事宝卷)前,都做如此表白。如一位讲经艺人在《大圣宝卷》开讲时说:

说者《大圣宝卷》一部劝善,弟子宣演,总要先宣朝代帝王,后讲贤人出世。总要讲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有苦有甜,有前有后,悲欢离合;先要讲到苦中之苦,难中之难,然后要讲到修仙成正,登山显圣,留芳百世,方成宝卷一部劝善。

《大圣宝卷》讲佛教高僧泗州大圣出身故事(见下)，“弟子”是讲经艺人——“佛头”的自称,讲经艺人都自称是“奉佛弟子”。这段表白声明:“讲经”就是通过讲唱宝卷中“贤人”

(主人公)“有苦有甜”、“悲欢离合”的故事,达到“劝善”的目的。“善”的标准是什么呢?将各种宝卷中所阐述的种种善行归纳起来,它们主要就是:尚礼仪,守国法;敬天地,礼神明;孝敬父母,家庭和睦;邻里互助,乡党团结;敬老爱幼,救济贫困;惩治邪恶,广行善事,等等。这些善行,是中国历史上平民百姓世代相传并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体现了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也表现了平民百姓的“家国观念”,个人对家庭、社会的义务和责任的认识。我在一次“大圣会”上听到一位佛头讲“报三友四恩”,其中讲到“报皇王水土恩”时说:

(白)有些人要说:“我们种了国家田,缴了公粮,缴了国税,还有哪些地方不曾报到?”我们要晓得,国家收公粮、国税,不是自己上腰(包)的,国家有几十万军队,日夜守卫在国防前线。

(唱)如果外国来侵略,朝中它有百万兵。

(白)所以我们缴公粮、国税要积极缴清,不要藉口拖欠。这就叫:

(唱)皇王多有道,端坐在龙廷;八方多清静,四处罢刀兵。

这样的联系虽然牵强,但表现了民间讲经艺人与与时俱进的努力;同时,在民间信仰活动中的此类宣教,恐怕比某些正面的宣传,效果会更好。

自然,做会讲经的道德教化更多是体现在家庭和社会伦理方面。它不仅通过宝卷人物故事来表彰此类善行美德,许多仪式也具有教化的作用,比如“醮殿”和“破血湖”,是做会讲经活动最常做的两个仪式。醮殿是子女祭拜、祈求冥间诸神(地狱十王和东岳、地藏等)为父母(公婆)灭罪、延寿的仪式,讲唱《血湖卷》(即《目连宝卷》)。这两种仪式虽然宣讲地狱的恐怖,但它们的实际作用是解除老年人对死后遭受地狱之苦的精神压力,活得愉快、长寿;同时传播孝道,调适家庭关系。按照靖江民俗,子女(包括媳妇、女婿)必须为父母做这样的仪式,而且在做仪式时必须亲自到场,即使平时父子、婆媳有些矛盾,也不得缺席,否则便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子女、儿媳们跪拜神前,为父母祈祷灭罪、延寿,做父母的即使平时有些不愉快,此时也都化解了。我在调查中了解到,四十岁左右的农民都认真为父母、公婆做这类祈祷仪式,按他们的话说是“前人做给后人看”。他们都已生儿育女,孩子们也懂事了,也被拖来跪在神前。这也说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延续力:农民们不会去读古老的经典,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正是这样通过做会讲经活动,一代一代在民间传承。

做会讲经以劝善为核心,而以信仰为“体”,是因为它是在一系列敬神拜佛的活动中进行的,是一种民间信仰活动。但它同宗教信仰不同:做会时“请佛”请来的各路神灵尽管多达数十位,但祭拜的主神却只有三茅、大圣、观音、地藏、梓潼、土地等十几位,“做会”的名称便以这些神灵的名义命名,最常做的如“三茅会”、“大圣会”、“观音会”等。其中,大圣是唐代佛教高僧僧迦(俗称“泗州大圣”),观音、地藏是中国佛教的菩萨;三茅是道教的祖师,梓潼、土地也可纳入道教的神系。这些神灵不仅佛道混杂,靖江宝卷中讲述他们的出身故事,也同宗教传说不同。比如,“三茅”是道教茅山派的祖师茅盈和他的弟弟茅固、茅衷,称“三茅真君”,西汉人。他们的事迹传说,可见晋葛洪《神仙传》和后人所编《历代神仙通鉴》、《列仙全传》等道书,清代道教徒还编过一本《三茅真君宝卷》。靖江讲经艺人唱的《三茅宝卷》,与上述道教传说和宝卷毫无关系:汉高祖时,曾做过“山大王”的姬某归顺朝廷,赐姓金,名宝,官至丞相,生三子——金乾、金坤、金福。金福舍妻修道,后来又度两位哥哥修道升天,玉皇封他们为大茅、二茅、三茅真君。《大圣宝卷》的故事也同那位唐代高僧毫无关系,讲的是元代故事:张举山员外老来无子,改恶从善,观音菩萨送他一子,取名张长生。张长生学道成仙,玉皇封他为泗洲大圣,得观音之助,降妖伏怪,显圣狼山。其中的降妖伏怪的故事,取自苏北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神话传说。以上可见靖江宝卷中所架构的神仙体系,不是建立在宗教观念之上,而是出自实用的目的。这些神佛接近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

也为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和精神的困扰。

说到靖江做会的信仰特征,必须了解做会“只做延生,不做往生”的特殊规定。“延生”、“往生”是佛教名词,“往生”指世间有情众生生命终结生于他方世界,就是指“死亡”;“延生”即“延命利生”。产生于宋元时期的几种佛教宝卷都是用于超度和追荐亡灵的法会。明清民间教派也为民众做此类法事,如流传很广的弘阳教,便有多种超度亡灵的经忏、科仪宝卷。即使当代在与靖江一江之隔的张家港市农村的“做会讲经”,也做追荐亡灵的法会。靖江做会讲经不为死去的人做会追荐超度,只为活着的人做会延命利生,使婴幼儿和年轻人免灾、健康地成长,使老年人活动得愉快、长寿。这是积极的人生理想。

一般研究者认为民俗信仰具有强烈的神秘性,但靖江做会讲经活动没有神秘性,除了个别仪式(如“破血湖”)比较严肃外,大部分做会过程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是当地农村中的说唱演出和娱乐活动。首先,讲经过程中听众不断参与歌唱“和佛”(唱佛菩萨名号)的形式,就使听众与宝卷中主人公(“贤人”)悲欢离合的故事融为一体,身心得到充分的愉悦。其次,讲经艺人在演唱中的“插花”,也常使听众乐开怀。这类插花有的是纳入宝卷的故事结构中的笑话,称“内插花”;有的是即兴发噱,比如,在“上茶”(给神佛上供的仪式)时,讲经先生取笑“和佛”的人不用心,插唱:“你这个和佛奶奶果希奇,和起佛来三声高来两声低。看你们吃饭能像爬山虎,和佛能像落汤鸡!”这时,“经堂”里“阿弥陀佛”声和大家的欢笑声便融合在一起。

目前靖江做会讲经都是“家会”(由“斋主”自家做会),一般都避开农忙时节。一家做会,不仅亲友带上礼品“上会”祝贺,邻里也来听经,斋主家一律热情招待。我参加的一次会,晚饭后讲“小卷”,由于来听经的人特别多,经堂(正房的明间)里坐不下,便将“经桌”、香烛搬到院子里,拉上电灯,那场面像欢乐的节日。有一次做会,下午讲经结束,和佛的老太太们唱起“偈子”(称“走偈子”),轮流唱,就像赛歌。如:“西方路上有条街,两个孩童哭哀哀。小孩你们哭什么?我家父母吃素来开开斋。”“一棵桃树两条根,小姑娘梳头两边分。大姑娘问你哪里去?我去斋主家和佛看花灯。”大家都说一位老太太唱得好,请她唱。这位老太太谦虚地即兴唱道:“斋主家门口有棵松,松树上盘九条龙。老龙不愿行风雨,缠我小龙显神通。”吃过晚饭后,这些老太太上楼休息,她们余兴未已,又继续唱偈子。

以上介绍的是靖江做会讲经的一般特征。

二、靖江宝卷是独具地方特色的口头文化遗产

靖江地区原属江阴县,明成化七年(1471)建县,隶常州府,流传做会讲经的靖江老岸地区也讲吴方言。从历史地理文化的发展来说,它属于吴文化区,靖江的做会讲经应当与吴方言区的广泛流行的做会宣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它即使同隔江的江阴、张家港(旧属常熟)地区的“做会讲经”也有不同之处。除了上文已介绍的“只做延生,不做往生”规定外,靖江讲经摆脱了历来宣卷“照本宣扬”的限制,是口头讲唱艺术,靖江宝卷自成体系,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口头文化遗产。

中国宝卷从产生时,便形成了“照本宣扬”的演唱形式。这种演唱形式出于宗教信仰,认为宝卷是神圣的“经卷”,不能唱(念)错一字。清及近现代的民间宣卷仍保留这种形式,一些手抄本民间宝卷结尾处常有“卷中倘有错误字,再宣小偈补团圆”,“卷中未免舛错处,六字真言补完成”的话,表明了宣卷(念卷)人惟恐唱(念)错的补过心情,而以补唱“小偈”或“六字真言”来“圆满”。靖江讲经丢开了宝卷文本而口头说唱,表明已摆脱这种信仰桎梏,使讲经艺人的演唱有了较大的自由,可以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广泛吸取民间文化的养料,丰富宝卷的内容。同时,也使讲经艺术像其他民间说唱艺术一样,出现了艺术竞争。

靖江宝卷富有地方特色,至今仍能生气勃勃地存活着,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靖江讲经宝卷自成系统,分为“圣卷”、“小卷”和“科仪卷”三类。圣卷是靖江最富特色的宝卷,已知约近二十种,《大圣宝卷》、《三茅宝卷》、《观音宝卷》、《地藏宝卷》、《梓潼宝卷》(又名《花灯卷》)、《血湖宝卷》(即《目连救母卷》)、《雷祖宝卷》、《寿星宝卷》、《东厨宝卷》、《东岳宝卷》、《土地宝卷》、《真武宝卷》、《财神宝卷》、《城隍宝卷》、《月宫宝卷》、《地母宝卷》等,它们都是讲唱神佛的出身故事。其中《大圣宝卷》、《三茅宝卷》等,上文已介绍,是靖江特有的宝卷,也是靖江做会演唱最多的宝卷。

有的圣卷在其他地区虽有同名民间宝卷,但靖江宝卷为这些神佛编造了特殊的出身故事。如《地藏宝卷》的故事与中国佛教地藏菩萨传说便完全不同:夏朝仲康王国母娘娘身患重病,被变做僧人的西天佛祖治好了。仲康王令金阁老(功善)带兵马来西天还愿。金阁老一行来到流沙河,一场大雪冻死三千小兵,只剩下十八名。佛祖接受了金阁老“代天行香”还愿,将三千小兵的阴灵收在阴山背后修道。仲康王赏金阁老回乡休息三年,将生还的十八名小兵封“总兵”。金阁老回到家乡,与夫人广结善缘。佛祖派绿鸭道人化做一只绿鸭下凡查看。金家田中稻熟,绿鸭顺嘴吃了三粒落地稻谷,回到西天,禀报金家善行。佛祖责怪他偷吃稻谷,罚他去还债。绿鸭变做瘦牛、小牛、壮牛,三次托生到金家,都因金阁老呵护,没能还债。佛祖让他投胎到金家为子,取名金藏宝。金藏宝十二岁,佛祖引导他到昆仑山修道。时陀罗山十名强盗结为兄弟,打家劫舍,要抢皇上的江山。仲康王令金阁老带兵征讨。十个强盗摆下“十绝连环阵”(刀山剑树阵、汤泼滚水阵、阴风寒冰阵、拔舌抽筋阵、洪水高桥阵、脱胎换骨阵、粉身碎骨阵、二半分身阵、丙丁火焰阵、阴山黑暗阵)应战。金阁老困在“十绝阵”中。佛祖封金藏宝为“地藏能仁”,让他带上三件佛宝破阵救父。他破了“十绝阵”,将十个强盗圈在那里修行;又劝父母和十八位总兵一起吃素修道。三年后,他带领大家到流沙河脱去凡胎,上了西天。佛祖又封他为“幽冥教主”,去九华山享受香火。十八位总兵封十八尊狱官,入幽冥掌十八地狱。十个强盗造恶太多,天上无份,封为“十殿阎王”,去阴山背后带领三千阴兵造地狱;他们不知地狱如何造,便依“十绝阵”造了十殿地狱。这本宝卷中不仅“杜撰”了“幽冥教主地藏能仁”的传说,也把“十殿阎王”的出身说成是强盗。其中的绿鸭故事,来自苏北民间传说。又如《东厨宝卷》,包括了“先天东厨司命”和“九龄灶君”两个故事。后者是流传较广的张单(卷中称张九龄)和郭(卷中称葛)丁香的灶王传说,故事有变异,并顺便讲了民间神“井栏将军”“灰堆姑娘”“粪缸姑娘”的来历。“先天东厨司命”的故事包含了开天辟地、世界劫难、人类起源、皇王治世等神话传说,想象奇特,多不见文献记载。如讲第一代皇王轩辕治国,见百姓种田辛苦,便派朝中二位“大力王”代人耕田。百姓不给二人吃饭,二人只好低头吃草,就变成了牛。

其他一些圣卷虽用的传统题材,但经过历代讲经艺人口头改编和再创作,不仅故事情节丰富,也极具地方特色,如《观音宝卷》来自早期佛教《香山宝卷》所述妙庄王三公主妙善的故事,江南宣卷普遍演唱这一宝卷,卷本一般二、三万字,但靖江的《观音宝卷》记录整理本近十万字。《土地宝卷》和《月宫宝卷》都是俗文学传统题材,这两种宝卷的故事在明代已经形成,它们什么时候传入靖江不详。但它们已纳入敬神的“圣卷”,说明是比较早的。清代前期北方念卷中也有这两种宝卷,前者名《佛说张世登宝卷》,今存康熙刻本;后者一般名《张四姐大闹东京》,或《摇钱树》,据鼓词改编。这两种宝卷在甘肃河西地区仍有流传,传抄的文本都较靖江宝卷简单、粗糙,而在江南宣卷中则找不到这两种宝卷。

靖江宝卷中的“小卷”讲唱一般的文学故事。小卷的产生,同靖江讲经口头演唱的形式和民众对做会娱乐性的要求有关。许多讲经艺人可以将口头流传的故事或书面的唱本、小说等,改编成宝卷的形式口头演唱。如《十把穿金扇》就是根据民国年间同名评弹唱本改

编,没有记载说明这个评弹唱本被口头演唱过,但靖江的先辈讲经艺人缪维新、宋惠郎等多人却把它改编成了宝卷演唱,由于群众爱听,一直流传至今。这样口头演唱的小卷在靖江到底有多少?难以统计,像其他地区的民间说唱文艺的曲目一样,经过听众的考验,有的被不断改编、丰富,成为某位讲经艺人的保留曲目;听众不爱听的,便被淘汰了。

靖江做会的“科仪卷”,指用于做会仪式讲唱的宝卷。“请佛”“送佛”“上茶”“解结”等仪式的宝卷都是歌谣体,讲经先生也可以即兴“插花”,唱一些诙谐、幽默的歌谣。有的仪式程序性强,便穿插说唱一些人物故事,如,“醮殿”仪式分做“报祖”“请王”两部分。“报祖”唱《李清宝卷》,这本宝卷的程序意义是让改恶从善的李清,从地狱中抄回“十殿阎王”的“圣诞”,以便“请王”。但卷中用了大量篇幅讲唱李清的结婚过程:说媒、行茶、催亲、哭嫁、别祖、上轿、押轿、送亲、拜堂,热热闹闹;穿插其中的媒婆,插科打诨,又使听众不断发笑。“请王”唱《十王宝卷》,依次“请”来十殿阎王“赦罪”,再“送”走他们。有一“殿”又可穿插讲唱一个故事,最常唱的是《七殿攻文》、《九殿卖药》。《七殿攻文》又称《梅乐张姐》,说的不信佛的梅乐张姐,被罚下了七殿碓磨地狱。现身说法的观音老母“打唱莲花”,却唱起了幽默、夸张的民歌:“莲花唱得热闹很,惊动许许多多。高个子只嫌檐头矮,矮子搬砖添后跟。胖子轧得浑身汗,瘦子轧得骨头疼。瞎子只吵望不见,聋子在吵听不清。……”听众乐得就跟和佛的人一齐唱“哎咳活菩萨”。《九殿卖药》唱的是九殿阎王“药王菩萨”的出身故事,但宝卷故事中的主角却成了他的妻子霍氏。霍氏与吕洞宾“斗法”,破解吕提出的种种难题,是一个“巧女型”的民间故事。

靖江各类宝卷中都包含了丰富的奇特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加进了大量的靖江民俗风情描写(如人生仪礼、衣食住行、岁时节令、游艺娱乐等),插入当地大量歌谣、谚语、俗语,而有了地方化的特征。同时,讲经艺人常常结合卷中的故事,传授各种民间知识,如《九殿卖药》“点药名”介绍了许多土方。更多的解释某些地方风物、名胜古迹的特点和来历,如《大圣宝卷》中对“南京不打五更鼓”“徐州不打春”“通州没北门”“龙灯十三节”等的解说;《三茅宝卷》中解释了“孤山(靖江唯一的山)只高十八丈”“茅山玉印缺一只角”“惠山的东岳菩萨站在天井里”等。

我曾提出,靖江宝卷具有“民俗志”的功能,是靖江民间文学的“集成”。靖江宝卷丰富的民间文化内涵,使它成为一大宗独具特色的民间口头文化遗产。

三、加大投入,发掘整理、研究开发靖江做会讲经和宝卷

历史上靖江的做会讲经曾遭到清政府的查禁。这个官方文书是两江总督批发的靖江县知县的请示,案由靖江的佛教僧尼犯有诱骗拐卖妇女等恶行,着令一律还俗、发配,顺便提到靖江“讲经”,自称劝善,村歌俚语,杂凑成词等语。建国以后,在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冲击的情况下,当地政府的领导并没有简单地以“封建迷信”将做会讲经查禁,而是提出整理和改革讲经的要求。这促使靖江许多文化工作者从那时起便积极参与记录整理讲经宝卷。此后,虽经“文革”的摧残,八十年代靖江讲经仍能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在各级政府文化部门领导下搜集整理和编辑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三套集成”时,靖江的文化工作者便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同时进行了靖江宝卷的记录整理,并编印了《三茅宝卷》《大圣宝卷》等宝卷。2001年底,由靖江市文化局编集为《靖江宝卷·圣卷选本》出版,收《三茅宝卷》《大圣宝卷》《香山观音宝卷》《花灯缘》(《梓潼宝卷》节选)四种宝卷。一年多后,他们又整理了小卷《十把穿金扇》(上、下集)和《土地宝卷》《月宫宝卷》《九殿卖药》等宝卷,结集为这本宝卷集。我在靖江调查做会讲经十余年,看到这些口头流传的宝卷被整理出来,自然十分高兴,特向从事这一工作的所有同志祝贺,向支持这一工作的领导表示感谢!同时,

我也想谈一点对继续发掘整理、研究开发靖江做会讲经和宝卷的建议。

2001年5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了被评审为世界最杰出的19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剧)、日本的能乐、印度的梵剧、意大利西西里的傀儡戏、西班牙的宗教神秘剧、韩国的宗庙祭典等，也有许多可引起我们思考的“文化遗产”，比如，乌兹别克的Boysun，是一种在节日、家庆、婚礼、丧葬、驱邪、治病、祈雨等事件中演唱的仪式化的音乐和歌舞；又如，俄罗斯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Semiskie保留的中世纪(十六、七世纪)俄罗斯民间文化，包括民居、衣饰、歌谣、音乐和民间信仰、仪式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今后将两年评审和发布新的项目。参考上述列入世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在我国古老的民间文化遗产中自然有许多可以列入，所以，中国有关部门也开始制定发掘和保护开发富有特色的民间文化遗产的计划，有的地方甚至启动地方民间文化项目的申报“遗产”的工作。

我没有让靖江的做会讲经去申请“世界遗产”的想法，但是，作为一项传承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色明显的中国地方口头文化遗产，靖江的做会讲经是完全可以入选的。因此，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发掘整理、研究开发两个方面，加大对靖江做会讲经和宝卷的投入，及早做好准备。

目前出版的这两部《靖江宝卷》所收九种宝卷，展示了靖江宝卷的特色。但是，作为一种口传文学，靖江还有大量的各种宝卷没有整理出来，同时也还需要记录和整理出它们的各种流传异文和科学资料本。由于许多老年讲经艺人相继下世，这一工作带有抢救性质。对靖江做会讲经的形态也需要做立体的记录，即对全过程做录音、摄像，为重要的讲经艺人建立个人档案，搜集做会讲经有关的实物等。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全面介绍做会讲经的文字、音像相结合调查报告，并建立“靖江做会讲经资料室(馆)”，将以上各方面的成果汇总保存。既为后代保留下一份做会讲经的实录、文献，也为进一步研究、开发做会讲经提供必要的基础。

开展靖江做会讲经和宝卷的研究，要有专家学者投入。自八十年代以来，靖江已接待多批海内、外学者前来考察，有的学者还写了介绍文章，可以说靖江做会讲经已经声名在外。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发掘整理工作没有跟上，至今做会讲经的全貌缺少综合性的详细报告，这就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推荐的力度。如果把发掘整理工作做得细致深入、资料充分，自然会吸引更多的海内外学者来研究它，进一步提升世人对靖江做会讲经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

靖江的做会讲经是在历史上相对封闭的民间文化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自改革开放以来，靖江已成为地方经济迅猛发展的城市。随着江阴长江大桥的开通，靖江已是水、陆交通要冲，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城市。在此新形势下，对做会讲经这一极具地方特色、历史悠久的民间文化资源如何保护和开发，建议纳入城市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

二〇〇三年六月六日于扬州